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第5期

总第5期

A—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1月6日

尊重实践对我国经济理论的检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董辅初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的简单回顾

一段时间以来，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把我国的经济理论弄得非常混乱。打倒了“四人帮”，经济理论界空前活跃，“四人帮”设置的理论禁区一个个被突破，被“四人帮”颠倒了理论是非正逐渐被纠正。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发生了很大的转折。许多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从实际出发，敢于面对新时期的新情况、新任务，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努力去解决问题，并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在这种形势面前，也有些人或惶惑莫解，或莫衷一是，或忐忑不安，或认为我国的经济理论在倒退。那末，应该怎样看待我国经济理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呢？理论上的是非究竟有没有客观标准呢？

客观标准当然是有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要看它对社会主义经济起了什么作用。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起了巩固和发展作用呢？还是起了瓦解作用？是对生产力起了促进作用呢？还是起了破坏作用？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只要我们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地对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进行历史的回顾，就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经济理论发生的转折，是一个合乎认识发展的辩证过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经济研究参考资料

第5期

总第5期

A—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79年1月6日

尊重实践对我国经济理论的检验

中国社会科学院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董辅初

建国以来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的简单回顾

一段时间以来，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把我国的经济理论弄得非常混乱。打倒了“四人帮”，经济理论界空前活跃，“四人帮”设置的理论禁区一个个被突破，被“四人帮”颠倒了理论是非正逐渐被纠正。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发生了很大的转折。许多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从实际出发，敢于面对新时期的新情况、新任务，思考问题，提出问题，努力去解决问题，并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在这种形势面前，也有些人或惶惑莫解，或莫衷一是，或忐忑不安，或认为我国的经济理论在倒退。那末，应该怎样看待我国经济理论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呢？理论上的是非究竟有没有客观标准呢？

客观标准当然是有的，唯一的标准就是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要看它对社会主义经济起了什么作用。是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起了巩固和发展作用呢？还是起了瓦解作用？是对生产力起了促进作用呢？还是起了破坏作用？归根到底，要看它对生产力的发展的作用。只要我们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理论同实践相结合地对我国经济理论的发展进行历史的回顾，就可以看到，目前我国经济理论发生的转折，是一个合乎认识发展的辩证过

程的前进运动。

二十多年来，我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肯定——否定——否定的否定。这里只能简略地作一回顾。

大体上从建国到五十年代末是第一个阶段。那时，我国从苏联学来了一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从二十多年的实践来看，其中确有不少正确的理论，例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要运用物质利益原则，两种社会主义公有制之间的交换要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社会主义企业必须实行经济核算等等。但是，其中也有许多不正确的部分。主要是贯穿着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突出地表现在不是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的观点去观察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已经“完全适合”。虽然斯大林同志在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曾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①从苏联学来的经济理论还错误地认为，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剥削阶级消灭了，国家“镇压剥削者的职能已经消失。”②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则只讲“团结一致”、“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不讲矛盾——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没有强调生产工具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充分重视劳动群众的作用。此外，在工业化的道路、发展农业、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使企业具有集中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存在许多形而上学观点。当然，这一阶段中，我国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方面也有许多创造和贡献，例如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等等。

大体上从五十年代末到“四人帮”被打倒，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其中又可分为两个小阶级，以文化大革命作为大致的分界。在六十年代贯彻“八字方针”时期，曾出现过某些类似当前

①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6页。

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1版，第400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的理论上的变化，但这个过程随即中断。这里略去未加考虑。

这个阶段，在实践的基础上，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并总结自己的经验，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打破了统治苏联经济理论多年的形而上学。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著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国的经济理论开始用对立统一的观点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提出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依然存在着矛盾，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和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提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充满着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阶段对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在生产力诸因素中对于劳动者的作用给予了强调，等等。这些都是对上一阶段经济理论中的形而上学的否定。

但是，认识不是直线发展的，加上种种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这一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出现了另一种片面性，主要是主观唯心主义倾向。例如，片面地夸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否认生产关系的变革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要以经济基础的变革为前提。在生产力问题上，从片面地夸大人的作用出发，进而把思想、干劲甚至政治说成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在强调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时候，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说成是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在指出按劳分配会带来收入上的实际不平等时，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抬头。在强调平衡的相对性，不平衡的绝对性时，否认平衡的必要性。甚至出现片面夸大政治的作用否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的错误观点。如此等等。

陈伯达、张春桥等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极力鼓吹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例如否定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鼓吹集体所有制要“趁穷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否认物质利益原则，胡说实行工资制和奖金是“钞票挂帅”，等等。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变本加厉地鼓吹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不仅把五十年代后出现的种种错误的经济理论收集起来加以系统化，把它们推到极其荒谬的地步，还炮制出许多反动理论，逐渐形成了“四人帮”的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经济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篡改，为他们实现篡党夺

权服务。“四人帮”的反革命经济理论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的危害是难以估计的。人们从实践中逐渐认识了这套理论的荒谬和反动，同时也逐渐认识了五十年代末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存在的错误，认识到这些错误的东西为什么可以被“四人帮”利用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这样，在打倒了“四人帮”以后，我国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即否定的否定阶段。例如，从肯定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肯定物质利益原则、肯定计件工资和奖金，到否定按劳分配是规律，否定物质利益原则、否定计件工资和奖金，再到重新肯定按劳分配是规律、肯定物质利益原则、肯定计件工资和奖金。这种否定的否定，表面看来“仿佛是向旧东西的回复”^①，回到了五十年代，一些五十年代的理论重新被肯定。实际上除去某些理论而外，从总体上看不是简单地回复到五十年代，而是在高级阶段上的“回复”。因为，在经过这两个阶段实践的多次反复，经历了成功特别是多次挫折，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使我们有可能去判断以往种种理论的是非。正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我国的经济理论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人们把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加以继承，不论这些理论是否遭受过批判；把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加以抛弃，不论这些理论是否广泛被宣扬。同时，人们还要探索四个现代化过程中的新问题，努力去创造新的理论。我国的经济理论正处于这种继往开来的阶段。毛主席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②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应该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是很丰富的。为了前进，为了发展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以指导四个现代化的实践，我们必须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尊重实践的检验，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进行系统的总结，革故鼎新，在建设社会主义中获得较多的自由。

下面想从这种考虑出发仅就三个问题简单地谈一点粗线的看法。

①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39页。

②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18—19页，人民出版社。

关于生产力因素的问题

关于生产力因素的问题，有许多方面需要重新研究。①生产力包括两因素还是三因素，在苏联有过争论，但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两因素论，②它也曾为我国多数人所接受。这个在国内外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可以说已为实践所解决。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能源、材料等劳动对象方面引起了重大的革命。新能源、新材料等劳动对象的被制造和被利用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例如核裂变反应所释放的原子能正越来越广泛地用于生产和其他方面，引起了工业的新的革命。人们正在探索利用核聚变反应所产生的原子能，如获成功，海洋中的氘将为人提供取之不尽的能源。届时给生产力带来的影响的巨大和深刻目前还难以预计。原子能在未被释放前是一种自然力，在被人征服以后，它又反转过来成为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巨大能力。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塑料等合成材料具有天然材料所没有的特性和优点，正在广泛地代替天然材料。人们制造出了许多高纯度、纯度稳定而可靠的金属，具有抗蚀性、耐高温性、良好的导电或电阻能力等新特性的金属和合金。现代化生产中的许多特殊需要要靠这些新材料来满足。生产实践表明，劳动对象不仅是生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且是生产力的因素。它们同生产工具、劳动力结合起来，提高了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各种新的劳动对象的使用，加快了生产的流程，提高了产品的质量，降低了物质消耗，还引起了工艺的变革，成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除草剂在农业中的应用，引起了耕作制度的变革，产生了免耕法就是一个例子。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劳动对象的生产 and 现代化，重视劳动对象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这里不打算多谈，只想就生产力中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这两个因素究竟哪个是最终的决定因素问题，谈一点看法。

在五十年代，我们从苏联学来的政治经济学中是这样说的：“在劳动资料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发展水平是社会控制自然的尺度，是生产发展的尺度。经济上的时代不是根据生产什么来

①这里不打算涉及一九五九年以后围绕平心同志的文章展开的论战。

②例如，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是主张两因素的。

划分，而是根据怎样生产、用什么生产工具来划分”，“生产资料本身如果不同劳动力结合，只不过是一堆死东西”，“人的劳动能力，他的智慧、技能和生产经验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而发展”，“劳动群众是人类社会一切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生产力”。^①这些观点无疑都是正确的，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问题在于没有对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在发展生产中的巨大作用作出充分的估计。因为正如毛主席所说的：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②，“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③

但是，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在正确地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同时，我国经济理论中也出现了另一种片面性，这就是把生产力中人的因素的作用片面地夸大为最终的决定作用，而把生产工具的作用说成是第二位的，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类错误口号作了理论说明。我们从《哲学研究》一九五九年第一期题名为《论生产力》的文章中摘引几段，就可以看出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倾向发展到了何等令人吃惊的程度。文章中写道：“在有阶级的旧时代，生产力中起着决定作用的，最能动的要素是工具，一般地是工具的变化引起人的变化，以至整个生产力的变化，自然人对工具也有其反作用，在没有阶级的新时代，生产力中最重要的有决定性的，最能动的要素是人，一般地是人的变化引起工具的变化，以至整个生产力的变化，自然，工具对人也有其反作用”。如此片面地夸大人的因素的作用，说到底是为了把精神、思想说成是历史发展的终极动因，鼓吹历史唯心主义。果然是这样。请再看文章中接下去的一段话：

“在旧时代的生产力中，人的政治思想的作用是自发的，是极其受限制的，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和技术比较起来，处于次要地位。而在新时代的生产力中，人的政治思想的作用则是自觉的，是不受限制的，对生产力的发展有决定意义，和技术比较起来，居于主导

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1版，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2页

②毛泽东《历史唯心主义的破产》，《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40页。

③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第381—382页。

地位”①。

陈伯达、张春桥等人从一九五八年起就鼓吹“精神万能论”。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加疯狂地鼓吹这种历史唯心主义谬论。张春桥公然说：“精神万能论不能批判，在一定场合，一定时间，精神万能论是对的”。江青则说：“人的思维可以决定物质”。在他们组织编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就把生产力的发展说成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趋向完善”、“广大人民群众 of 共产主义觉悟不断得到提高”的结果，绝口不提生产工具的改进。甚至把发展生产力看作是可有可无的事。从而胡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胜利是重要的，但不是第一位的东西”，第一位的东西自然就应当是精神了。

打倒“四人帮”以后，这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谬论受到了应有的批判。可是我们甚至在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中还可看到片面夸大人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例如认为发展生产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积极性。

可见，这还是一个有待进一步弄清楚的问题，否则将严重地障碍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障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在上述种种错误理论的影响下，有不少地方片面地强调苦干、大干、流大汗、拚体力，很不重视生产工具的改变，甚至拒绝采用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工艺，有的地方甚至违背自然规律一味瞎干、胡干、蛮干，给生产造成很大损失。

有些人在把人的因素夸大为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的决定因素时，常常提出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生产工具诚然重要，但它们毕竟是人创造的，要靠人去使用，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的因素。其实这种论调，极其陈腐。马克思主义在同历史唯心主义斗争中，早已驳倒了这种论调。普列汉诺夫就批判过。他写道：“人们常对马克思主义者说：谁也不争辩在人类历史运动中劳动工具的重要意义，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可是劳动工具是为人们所发明和人所使用的。你们自己也承认人们使用劳动工具需要比较地很高度的智慧的发展。在劳动工具改进上的每一个新步骤要求人的智慧的新的努力。智慧的努力——原因，生产力的发展——结果。这就是说，智慧是历史进步的主要推动者，这

①《哲学研究》1959年第1期第16页。

就是说，那些断定世界为意见（即人的理性）所支配的人们是正确的。”他指出：“这类指摘是很自然的，可是并不妨害它是无根据的。”①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把人的作用夸大为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的动因，必然导致把智慧、精神说成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的历史唯心主义。

那末，为什么说，这种理论是错误的呢？

毫无疑问，生产工具是人创造的，没有人的创造，生产工具是不会发展的。但是，决不能忘记，人是在既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既定的生产力下，利用既定的生产工具来创造生产工具的。这些既定的条件是人们不能自由选择的。马克思指出：“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生产力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而被他们当作原料来为新生产服务。”②普列汉诺夫也说得很明确：“人在作用于他之外的自然时，改变了自己本身的本性。他发展了自己的各种能力，其中也包括‘制造工具’的能力。但是在每一个特定的时期，这个能力的程度决定了生产力的发展所业已达到的水平”，“劳动工具既然成为生产的对象，那末制造它的可能性以及制造的完美程度的大小，完全取决用以制造的劳动工具。”③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十九世纪英国数学家巴巴奇曾试图制造一种计算机器，它能计算任何数字，它的运算是用穿孔卡片作指令的，它可以在一种记忆装置中贮存数字，可对运算结果加以比较。巴巴奇花了三十七年时间，倾家荡产，终归失败。其原因就在于他所追求的目标，“在一个每一个部件都必须靠手来装备的时代”，“在一个只有机械装置的时代是不能完成的”，“这种机器的出现必须等到电子学发展的世纪。”④

诚然，生产工具要靠人去制造和使用，但是要制造和使用生产工

①《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79页，三联书店。

②《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③《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685页，三联书店。

④参见：（美）I·阿西摩夫：《人体和思维》第190——191页，1978年科学出版社。

具，人们就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技能和经验，而人的生产技能和经验也是历史地确定的，它们只能随着生产工具的发展而发展，并以历史地形成的上一代人的生产技能和经验为出发点。当一种新的生产工具没有广泛地被使用以前，人们是不可能普遍地具有掌握和使用这种新的生产工具的技能 and 经验的。这就是说，人的生产技能和经验本身也要受到既定的生产工具的决定。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过程中，我们将大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我国劳动者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不高，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例如，我国从日本引进了三十万吨乙烯成套装置，利用这种装置在日本每个操作工、分析工每月能生产乙烯 337.5 吨，而我国只有 144 吨，相差达 2 倍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不少操作工人对工艺流程、设备性能、故障排除都不甚了解，操作事故时有发生。我国工人是勤劳、聪明的，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不高是由于以往生产落后，特别是生产工具落后以及生产不发达造成教育和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落后的结果。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发展教育、学习外国的生产经验，同时要靠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

还应该看到，生产工具的发展有其自身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规律。数字电子计算机已经经历了四代，正近入第五代。没有第一代的电子管的计算机，就不会有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各代计算机。人们只能遵循生产工具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去创造新的生产工具。不能设想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就能达到目前的运算速度，也不能设想第一代电子计算机就能把体积缩到很小。至于人们学习制造已有的新的工具，自然不必再沿着它的发展道路从最初的制造起。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我们现在谈的也不是一个问题。

最后，一种新的生产工具的诞生和广泛被采用，总是由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客观需要所决定的。这种客观需要也是历史地形成的。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① 蒸汽机的发明是一个为人们所熟知的例子。第一台大型电子计算机是为了适应原子弹的制造要求解决大量运算而在美国发明制造出来的。

① 《恩格斯致符·博尔吉乌斯（1894 年 1 月 25 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505 页。

当然，在生产力的发展中，人的因素决不是消极的，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人的作用更不能低估。马克思主义是充分重视人的能动作用的。人民群众具有无穷的创造力。但是，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这种能动作用也是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的能动作用。毛主席有一段论述军事的话精辟地阐述了人的能动作用问题。他指出：“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活动家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这段话的意思完全适用于分析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相互关系。劳动者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不能超越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但是在既定的物质条件下却可以能动地创造出许多奇迹来。许多劳动群众运用落后的生产工具制造出比较先进的产品就是例子。当然要制造这种比较先进的产品，首先要有这些生产工具和必需的劳动对象，而且这些工具和劳动对象还必须具有能制造比较先进的产品的性能。我们经常看到“人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人是生产力中最重要的因素”这类提法，对这类提法只能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

综上所述，我们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时，必须十分重视制造现代化的生产工具、生产各种新的能源和材料，否则就不可能把整个国民经济转到现代化的基础上来。同时，劳动者必须在这个过程中掌握现代化的科学知识、生产技能和经验，努力提高熟练程度。当然，也必须充分重视并发挥劳动者的能动作用。

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问题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怎样的一种关系？我们在认识上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如前所述，五十年代，我们从苏联学来的经济理论把它概括为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这当然是基本正确的。但是，人与人之间是否还有矛盾呢？在毛主席提出两类不同性质矛盾学说以前是没有解决的。实践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劳动人民在集体生产中结成的关系，劳动人民之间既团结一致、互相合作，又充满着矛盾。

^①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横排版第166页。

同时，五十年代，我们从苏联学来的经济理论还认为，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谁战胜谁”的问题就解决了，不再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不再存在阶级斗争了。实践表明，这种理论也是错误的。毛主席提出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的理论，使我们对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斗争有了新的认识。

可是，从六十年代初起，在我国的经济理论中却出现了另一种观点，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因素论。一些同志在试图用对立统一的观点来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共产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对立统一，任何社会主义经济范畴都可以分解为这两种对立的因素。例如，按劳分配即一方面具有共产主义因素——废除剥削、共同分配；另一方面具有资本主义因素——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两种因素的对立统一是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间对抗的经济根源。这种两因素论在文化大革命前曾被许多人所接受。尽管以后的实践证明，这种理论是不正确的，但这是一些同志在试图解释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现实时提出的一种看法，是认识问题，而且看法本身也是可以讨论的。

人们否定这种理论是在“四人帮”把它推向极端，利用它来实现反革命政治纲领并对国民经济进行破坏的时候。“四人帮”宣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这样的二重性，即一方面是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因素，另一方面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传统或痕迹，即资本主义因素，并进一步说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这种二重性“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党内资产阶级形成的前提。”由此出发，“四人帮”进一步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对抗关系，认为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就是阶级对抗关系，并且说：

“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二重性，既要认识资产阶级那一方，又要认识无产阶级这一方”，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中“会不断地分泌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党内资产阶级”就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四人帮”利用这种反革命理论进行煽动，处处制造对抗，把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老工人、一切不愿跟“四人帮”走的劳动人民作为资产阶级或党内资产阶级进行

斗争，要统统打倒，使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遭受了一场浩劫，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其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的大泛滥。“四人帮”的破坏使我们认识到这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因素论”是错误的，资本主义不是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产生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恰恰相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是通过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破坏和瓦解才得以发展的。

那么，怎么来说明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存在的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呢？二十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剥夺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归全体劳动人民所有，只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全面建立的开始，只是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建立和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灭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全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发展和完善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灭也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生产资料的个体所有制的集体化，解决了生产资料从归个体农民所有转变为归农民集体所有。这种生产资料归属关系的转变，标志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个体小生产的生产关系开始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个体经济的生产关系还会或多或少地存留着。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哪里？并不是象上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因素论”所主张的那样，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中，而是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外，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对立。大家都承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在社会主义经济单位①外部会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地下工厂、地下包工队、长途贩运等等。但是，还应该看到，在社会主义经济单位内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般说来，它是占主导的，它本身还要发展和完善；同时还有资本主义甚至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后者不会随着资本家的生产资料的被剥夺和个体生产者的生产资料的集体化而从社会主义经济单位中立即退出历史舞台。

其实，这种情况是合乎历史发展的辩证过程的。以解放前我国的资本主义企业为例。我们从一些资本主义企业、帝国主义举办的企业中可

①这里说的社会主义经济单位系指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商店等等。

以看到，特别是在早期，那里不仅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还存在着封建主义的、甚至带有浓厚奴隶制性质的生产关系，例如把头制、工头制、包身工制、养成工制等等。①后面列举的这些生产关系是从奴隶制、封建制演化而来的，在这些生产关系下，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具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受到类似奴隶制或封建制中的超经济剥削。在我国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会存在封建主义的甚至带有浓厚奴隶制性质的生产关系，这是毫不足怪的。这不仅因为资本家利用这些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来加强对劳动者的剥削，而且因为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资本主义企业的建立，特别是早期，不可能马上摆脱封建主义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解放初期，我们在原先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进行民主改革，就是为了消灭把头制这一类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

应当看到，我们是在原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生产力极端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展、小生产如同汪洋大海这样一个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的。这种历史条件使得我们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会很快就是完善的和充分发展的，并不象我们在五十年代从苏联学来的经济理论所说的那样“国营经济中的生产关系是最成熟、最彻底的。”②例如，在我们的全民所有制经济中，社会分工很不发达，管理落后、实行大体平均的低工资制等等。这种历史条件还使得在社会主义经济单位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会存在某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会更多地存在封建主义的、小生产的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例如不少社会主义企业存在贪污盗窃、挥霍浪费、官僚主义、本位主义、因循守旧、不思革新、自给自足、大而全、小而全、甚至打骂群众等非社会主义的经营方式、经营作风和活动。清朝末年李鸿章、张之洞等人把官办工商企业办成封建官僚衙门，国民党的官办工商企业也是这类封建官僚衙门。为什么我们的某些全民所有制企业也竟然会官工化、官商化，办成类似的封建官僚衙门呢？这里有生产力方面和社会经济历史条件方面的原因，同时也说明，这种种旧的生产关系不会在生产资料的归属关系改变以后从我们的社会主义企业立即消失。社会主义经济单位内部和外部的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①参看《旧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1977年，人民出版社。

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428页，1955年人民出版社。

以后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所在。它们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严重的腐蚀瓦解作用。它们同现代化的大生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严重障碍。

在批判“四人帮”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因素论”中，有些同志之所以想不通，就是因为不认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面建立和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灭要落后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转变为全民所有以及个体所有制的转变为集体所有，从而不认识在社会主义经济单位内部（而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还会存在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社会主义经济单位混为一谈。于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充满着矛盾的时候，就误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共产主义因素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对立统一。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又出现了另一种相反的错误认识。有的同志说，在他们那里，“在一段时间内，在批资本主义中，反复强调了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这是不妥当的”，“‘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含糊不清。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本身不存在资本主义。提出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的口号，往往就对准了社队集体工副业，混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这里讲的集体经济就是人民公社。怎么能说，因为人民公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本身就不存在资本主义”呢？在人民公社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占主导的，但是不仅会有某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且还有更多的小生产的、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难道对于人民公社中的一平二调、强迫命令、某些干部打骂群众、宗法式家长式的统治这些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要批么？难道对于自给自足、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等小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生产关系不应该帮助纠正么？问题显然不在于该不该批“集体经济内部的资本主义”，而在于过去在“四人帮”的反革命理论影响下，有些地方把社会主义（如“社队的集体工副业”）当作资本主义来批了，把社员群众正当经营的自留地、家庭副业以及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来批了，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了。在指出了这一些错误作法以后，不能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否认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内部会有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应该说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比资本主义的更多），从而取消了继续改造这些旧生产关系的任务。

①参见1978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应当看到，在我们这个原来生产力很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达、封建主义根深蒂固、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干部和群众中封建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市场，一些干部和群众往往把它们混同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的社会主义来颂扬和实践，同时他们也容易“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①甚至把科学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资本主义，把它作为资本主义来反对。我们经常见到把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当作共产主义来推行，把按劳分配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当作资本主义来反对，就是一个广泛存在的例子。这也是在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改变之后，在社会主义经济单位内部还会长期存在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原因。前几年，“四人帮”曾经利用了一些干部和群众对科学社会主义缺少正确了解，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歪曲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他们蒙蔽了一些干部和群众，使他们在反对资本主义的好心下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反对了。现在我们揭批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理论，不能又反过来否认社会主义经济单位内部除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外，还同它往往相交错地存在着不少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要继续发展和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时也要继续改造那些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问题

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过去我们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上，特别是全民所有制问题方面，受苏联的经济理论的影响比较深。其中有一些正确的方面，例如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把个体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建立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等等。同时，也有一些不正确的方面。例如说，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的解决就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解决了”，“在国内，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后根源被消灭了”，“资本主义分子的产生过程停止了。”②又比如说：“国家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国家的社会生产形式是社会生产的高级形式”，

①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1970年第49页。

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78、395页，1955年人民出版社。

“完全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企业是彻底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等等①。

从五十年代末起，学自苏联的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的理论，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谈到的“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实际上就涉及到了改善全民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在集体所有制形式方面也有所突破，使集体所有制具有了较为灵活的形式。同时，提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也是在所有制问题上对苏联理论中的形而上学的否定。

与此同时，在所有制问题上从那时起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理论。例如，认为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可以脱离生产力的状况。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过“趁穷过渡”的理论，鼓吹过集体所有制立即“趁穷”过渡到全面所有制，鼓吹过把自留地和社员正当经营的家庭副业作为资本主义要加以取消的理论。在“政社合一”问题上也宣传过一些不恰当观点。陈伯达、张春桥等人是煽动“共产风”，破坏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罪魁。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再在所有制问题上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黑货，说什么自留地、社员家庭副业是“资本主义尾巴”，要立即割掉，什么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要靠“穷精神”立即过渡到大队、公社的基本所有制，什么集体所有制是“集体私有”，什么所有制的性质是由企业领导权决定的，什么“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关键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什么我国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已经“蜕化变质为走资派所有制、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等等。

打倒“四人帮”以后，他们在所有制问题上制造的种种谬论受到了批判。但是，过去我们在五十年代从苏联学来的经济理论中一些不正确的部分仍有待重新认识。这主要是把所有制问题理解得比较狭隘，看得比较简单，存在不从发展上看问题的观点。

所谓理解得比较狭隘，主要是指把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局限于仅仅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去考察，而不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总体上去把握。生产关系问题中自然存在着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为了便利，可以单独进行考察。但与此同时，不能忘记，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都是所有制的不可分割的内容，例如产品的分配，就

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429页，1955年人民出版社。